

西域文明史概论

(日) 羽田亨

中华书局

目 录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解题·····	间野英二
-----------------------------	------

西域文明史概论

作者自序·····	3
一 西域的形势·····	5
二 中西交通与西域·····	6
三 古代西域的人种·····	8
四 西域的宗教·····	15
五 西域的美术(一)·····	22
六 西域的美术(二)·····	30
七 西域的汉文明·····	38
八 汉人的西域经营与西域文明·····	48
九 回鹘部族的迁住西域·····	59
十 回鹘时代的西域文明·····	63
十一 结语·····	74

西域文化史

原 序·····	77
前 篇	
第一章 绪论·····	79

第二章	西域的民族	84
第三章	西域史的曙光	91
第四章	亚历山大的东方经略与巴克特利亚及安息	95
第五章	民族的移动	100
第六章	汉之西域经略	102
第七章	贵霜王朝	105
第八章	哒、突厥之活动	107
第九章	唐之西域经营与伊斯兰教势力之东渐	110
第十章	回鹘的西迁	113
第十一章	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	115
后 篇		
第一章	西域与希腊文化	119
第二章	粟特人与商业	125
第三章	粟特语及天山南路通行的诸种语言	130
第四章	西域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典籍	136
第五章	宗教美术	149
第六章	西域与汉文化	162
第七章	回鹘的西迁与西域文化	169
第八章	突厥族与伊斯兰教	176
第九章	帖木儿王朝与突厥文化	181
第十章	其后之概观	187

译者前言

日本羽田亨教授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是我年轻时非常喜欢的两部关于新疆、中亚历史文化的经典著作。前者我曾首先读过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元芳译本,后来又看到了1931年钱稻孙的译本。二者中以钱本译文较好(但此本无图版)。在阅读这两个译本时,我都曾根据日文原文改过,特别是对钱本我曾从头至尾仔细校改过。后者(《西域文化史》)我曾在上世纪60年代译为汉文,1981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我又根据日文原文,参考钱氏的译文将《西域文明史概论》重新翻译了一遍。日文原书中的“补正三则”已分别补入相关的部分中。对《西域文化史》我也根据日文新版又校阅了一遍。为了读者的方便,我已将注释中的德、法文论著,分别译成为汉文。

1992年日本东京平凡社曾将二书合为一册作为东洋文库第545种重新出版,书后并有日本中亚史专家间野英二教授撰写的有关二书的长篇解题,这次也一并译出,但把羽田氏的传记移到了解题的最前面。

今年春天,当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教授和我谈起,中华书局打算把二书合成一册重新出版时,我马上就答应了下来。并不顾年老体弱和教学工作的繁忙,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概论》的重新翻译和亲自输入电脑的工作。《西域文化史》因1981年本已为横排本,在别人的帮助下,也很快地输入了电脑。

任务的迅速完成,这主要是和我一生从事西域语文、历史、文化学习、研究的经历有关,对此有所偏爱,乐此不疲。加之听说新疆正在制订编写多卷本新疆史的计划,也希望能在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有关西域语言、历史、文化的研究,近一百年来已成为国际上的显学。我国过去,特别是近些年,虽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比起国外来,在某些重要领域仍是空白。这和西域研究对我们的重要性及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匹配。希望通过羽田亨教授此二书的重新出版,唤起我国学者对西域研究的兴趣,引发更多的青年人投入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感谢中华书局有关人士对此工作的支持!

耿世民

2005年5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 《西域文化史》解题

间野英二

羽田亨教授生平

这篇介绍文字是在我发表在 Sinica(《汉学》)202 期(1991 年)上《羽田亨》一文的基础上略加补充写成的。

羽田亨教授于 1882 年生于京都府北部日本海附近的峰山镇。先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1907 年毕业于东京帝大文科大学史学科(汉学专业),毕业论文为《蒙古窝阔台时代的文化》。他在东京帝大的老师是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也是满蒙史、西域史研究的创始人)白鸟库吉。羽田亨在大学学习期间深受其影响,之后终生都以白鸟为师。东大毕业后,返回京都,入京都帝大大学院(研究生院),两年后(1909 年)任京都帝大文科大学讲师。以后的五十年羽田一直在京都大学任教。

在京大期间,后继任文科大学副教授。1922 年以《唐代回鹘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1924 年任文学部教授。以后主要是在该校担任东洋史学第三、第二讲座的工作,培养出诸如宫崎市定、田村实造、安部健夫等优秀学者。

由于羽田氏也长于行政工作,所以曾先后担任京大文学部部长、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1938 年到 1945 年大战困难期间,还担

任京都大学第十二任总长,为确保治学的自由和创办京大人文学研究所倾注了心血。1936年当选为学士院院士。退任京大总长职务后,主长东方文化研究所之职。并任日本议会上院议员。在学会活动方面,曾先后担任东洋史研究会、东方学会首届会长。1952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1953年被日本政府授予文化勋章。1955年被法国政府授以 Legion de Nour 勋章。1954年被选为京都市名誉市民。1955年因病去世,享年73岁。

羽田亨教授的研究领域,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北亚史(满蒙史),如《元朝秘史中所见的蒙古文化》等关于蒙古史的研究。与其学位论文题目关于草原游牧时代回鹘史研究有关论文有:《九姓回鹘与 Toquz Oghuz 的关系》、《漠北地区与康国人》等。在后一论文中,他在日本学界首次指出游牧民国家与粟特胡人的密切关系。这方面的成果都已吸收到《西域文化史》一书中。此外羽田也重视这方面史料的收集和刊印工作,如《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蒙古篇)》。之后,这方面的工作有由田村实造指导完成的《明代满蒙史料》(全十八册)大部头的著作。在辽金史和满洲语研究方面,羽田教授编有《满和辞典》等。

第二为西域史、中亚史、敦煌学方面,这是羽田亨用力最多的领域。他早在1910年就发表了题作《伯希和(Pelliot)中亚旅行——敦煌石室遗书发现始末》的文章,指出敦煌发现的新史料的重大意义。之后十分关心海外这方面的研究动向。通过《近年来(国外)东洋学的进步》等介绍文字,为日本学界提供了最新的信息。他本人也着手新疆出土文献的研究。在汉文文献研究方面,研究了大谷探险队携回的李柏文书,发表了诸如《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等著名论文。但为羽田亨教授赢得国际声誉的,是他

关于出土回鹘文献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宗教文献的研究。佛教文献方面有《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摩尼教文献研究方面有《吐鲁番出土摩尼教祈愿文残卷》等。以上论文以其独创性而使世界学术界为之惊叹。《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二书就是羽田教授在深入、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可视为这方面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第三是东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羽田亨教授生前曾对《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古代中亚旅行记的原文进行了严密的校订和刊布工作。此外,尚撰有阐述帖木儿与明朝关系的论文(如《帖木儿与永乐帝》),以及综论隋唐文化的国际性的论文《隋唐时代的文化》等。他对东西交通史的观点也在这两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第四是民族学方面,这方面最初有他关于北亚游牧民之间萨满教研究的两篇论文。之后羽田虽在这一领域未再深入研究,但他很早就认识到萨满教研究的重要性,这一点说明他的先见之明。

此外,羽田亨教授也是资料的搜集家。他为日本带回了诸如《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等有关满语研究的重要材料,以及回鹘语文献、突厥碑文、回鹘时代碑文拓本、有关西域古代绘画模写本等许多贵重资料。这些物品现藏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等处,为后学者带来了许多裨益。此外,羽田氏还写有悼念同时代一些著名学者的文字,如《作为史料收集家的内藤博士》、《桑原博士——东洋文明史论丛序》、《回忆滨田先生》、《Radloff 博士》等。羽田亨生前所撰写的重要论文,他逝世后由其弟子们收入二卷本的《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历史篇,下卷语言宗教篇,京都,1957,1958;再版,同朋社,1975)。

羽田氏学问的最大支点是罕见语言学能力。据我所知,他除英文、德文、法文、俄文、中文等现代语言外,还通晓古汉文、突厥语、蒙古语、满洲语、藏语、波斯语、梵文等东方语言,并对粟特等新发现的古语也有相当的知识。他在多处指出仅靠汉文史料研究西域史的局限性,强调要全面掌握史料,包括对欧美新出史料的研究。他曾说“对研究(西域史)的学者来说,不可或缺的第一武器就是语言学知识,否则就达不到同欧美同步的水平……”(《近年东洋史学的进步》)。

另外,在西域、中亚史的研究中,他还指出要重视对当地语文史料的使用。他批评了日本史学界长期以汉文文献为主要史料的研究方法。1970年以后,由于日本年轻一代西域中亚史研究者都能克服语言学方面的障碍,这方面的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善。

再有,羽田亨教授除语言学方面的才能外,在治学上具有冷静沉着的判断能力,对尽可能掌握的大量材料能给予客观、合理的处理,从而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方面的天赋,除表现在这里介绍的两部论著外,也反映在《宋元时代总说》、《奈良飞鸟时代文化综论》等概论性的著作中。

羽田教授在历史研究中对语言学的重视,可能来自他的老师白鸟库吉教授的教导。其论说的简洁、明快、富于客观性的叙述等风格,可能受到他京大时期过往密切的内藤湖南、桑原鹭藏的影响。总之,羽田教授在学界可称之为“严师”,有点像大家对现代东洋史专家宫崎市定氏抱有的“畏惧感”。

在学术界以外,羽田氏尚与三岛海云(Karpis 食品公司老板)、武田长兵卫(制药界的巨擘)等企业界的人士有过来往。他在与兵田耕作、池田宏等学界比较亲近的友人聚会时,更是谈笑风

生,这里绝见不到其“严师”的一面,而表现出吸引别人的无限魅力。

现在在京都北郊上贺茂,在地近羽田住所处设有附属京大文学部的羽田纪念馆(内陆亚细亚研究所),其促进内亚研究的基金出自羽田教授的亲友三岛海云、武田长兵卫等人的捐助。由学界外的朋友捐资,为一位学者建立这种纪念馆还是罕见的。纪念馆正厅墙上悬挂的羽田亨的遗像给人以既严肃又温暖的感觉。

最后,还要提到羽田教授的长子、继承其父业的京大文学部教授羽田明先生。他也是中亚史、突厥民族史方面的专家,可惜也已于1989年末因病去世。为此只有作为其弟子之一的笔者受命担当撰写解题的任务。

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都有一些必读的经典著作。就西域史而言,已故羽田亨教授的《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二书就属于这种著作。但由于该二书早已绝版,不仅书价昂贵,而且也不易买到。这次东京平凡社把此二书合为一册,收入《东洋文库》加以再版,且售价较廉,大大方便了读者的购阅,实在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下面我对二书的价值加以简要介绍和补充。

一、西域一词的含义

这两本书都是讲西域的历史、文明和文化。“西域”是公元前后中国人指称“西方的地区”的一般用语,有广狭二义,前者指包括罗马、印度在内的广大地区,后者则仅指帕米尔以东的中国新疆地区。大致与现在日本流行的所谓“丝绸之路”同义。

二书书名虽都使用“西域”一名,但所指内容并不相同。《西域

文明史概论》讨论的内容仅仅限于新疆范围,而《西域文化史》所涉及的范围较广,也包括前苏联中亚各共和国在内,即一般说的“中亚细亚”范围。这一点希望读者加以注意。换句话说,前者可称之为《新疆文明史概论》,后者可称之为《中亚文化史》。

二、对二书的总论

现在先讲一下该二书刊行的由来及其内容、特点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

《西域文明史概论》于1931年由京都弘文堂书房刊印。二战后,曾多次再版。最新版于1974年由东京的弘文堂书房出版,印数较少。此书在国际上评价很高。1934年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元芳的中文译本(耿按:在此之前尚有1931年出版的钱稻孙的中文译本)。此书除开头的序言外,由11章组成。1—8章为对回鹘(古代维吾尔)人迁居新疆前西域的论述。这部分以前题作《西域文明的概观》(上)、(下)在《德云》杂志上分六次连载过(从创刊号到二卷二期,1929—1931年)。《德云》杂志为由京都妙心寺德云院主持柴山玄信等人编集发行的民间刊物,其主旨是弘扬精神文明,提高教养,主要刊登当时日本学术界名家诸如内藤虎次郎等人的论文。当时已在京大文学部任教的羽田亨教授也应邀为该杂志撰稿。《概论》就是在连载文章的基础上,又补加9、10二章及11章和结语而成。其内容主要是论述西域(新疆)文明的性质以及20世纪以来各国考古队在当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此书关于西域文明的结论主要是:

1. 在9世纪回鹘西迁西域前,当地在宗教、美术等方面虽受到希腊、西亚、印度等西方文明的强烈影响,但对中国内地文明对

该地区的影响认识不够。

2. 回鹘人移入后,开始时可清楚看到中国内地文明的影响,之后产生了西方文明与中国内地文明融合的独特合成文明。

3. 之后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影响,西域古代文明从 14 世纪末开始逐渐从西域消失,从而迎来了全新的情况。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书中有许多彩色图版,用来说明新疆出土的壁画、文书等新的考古资料。可惜原书中的彩色图版在新版中被代之以单色版。

《西域文化史》曾在 1936 年作为《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五卷《中央亚细亚文化》(20 章)刊行,后又新加了末章《其后的概观》及图版、注释而成,共 21 章,1948 年由座右宝刊行会重新出版。该书出版后也受到很高的评价,先后有耿世民的汉文译本(1981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斯拉木江等人的维吾尔文译本出版。

此书分为前后两篇。前篇主要讲述中亚从远古直到 17、18 世纪的政治历史,后篇主要论述中亚的文化史。与《西域文明史概论》一书比较,此书的特点是:

1. 所包含的范围扩大到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西部地区,也即整个中亚。

2. 前篇内容主要论述《西域文明史》未涉及的新内容。

3. 后篇内容虽基本上与《西域文明史》相同,但反映了著者此后研究的新进展,所涉及的年代也从《西域文明史》的 14 世纪延伸到 17、18 世纪,特别是论述了不见于前著的帖木儿王朝和乌孜别克时代的文化。

4. 也有许多彩色图版,并据此展开了讨论。

总之,二书的内容虽相似,但各有自己的特点,可以互相补充,

从中可全面看到作者对中央亚细亚历史的观点。

在阅读《东洋文库》这一合订本时,读者应先读《西域文化史》的前篇,把握中亚史的全貌,然后再读《西域文明史概论》,了解作者对西域文明、西域文化的基本观点,之后再阅读《西域文化史》后篇,进一步加深理解。

三、两书的价值

从《西域文明史概论》刊行到现在已过去 60 年,从《西域文化史》刊行也已过去 43 年。这次的重新合刊重印,说明了二书在我国(按指日本)中亚史研究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它们不仅具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而且其内容至今尚未失去其价值。现简单加以说明如下:

二书的最大价值,是在世界学术界较早阐明了中亚文化、文明的性质、特点。中亚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特别是欧洲和俄国关于这方面的论著甚多。但从总体上说,能清楚、明快阐明中亚史的著作当时和现在都不多见。二书对中亚文化、文明性质的结论,以今天世界学界的水平加以评判,也全无全部订正的余地。由此可见二书的划时代的价值。

作者作结论前十分慎重,尽量全面考虑问题,避免片面性,这在书中随处可见。

如:“……在高昌摩尼教经典中已有佛教经典的混入……这种吸收情况是否早在摩尼时代已存在,或稍在其后,抑或是在摩尼教流行于高昌时方才发生。这一点实有认真研究的必要。”(《西域文明史概论》)

再有,在谈到高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种摩尼教徒使用的

历书时说：“此历完成的时间虽难确定，但大概是在回鹘人迁来之后……”（同上书，页 83）

作者在介绍德国学者史罗德（Schrader）关于亚利安（Aryan）人原住地的观点后，评论道：“……至少他提出的关于狭义亚利安族（即印度—伊兰人）的发祥地问题，已为多数学者所一致承认。”（《西域文化史》，页 11）

二书的种种论点中，至今仍保有价值的有：

1. 明确否定 8 世纪前中国内地文化对中亚的实质影响，并肯定中亚文化的西方性质。
2. 新疆与西面河中地（中亚）的经济不同，后者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3. 中亚作为缓冲地的存在，避免了周围大势力的直接冲突。
4. 提出中亚作为导管的学说。像水源与出口之间的水经过导管后发生变化一样，经过此地的文化也应发生变化。
5. 羽田亨教授很早就看到粟特胡人在国际商业活动方面的重要性，为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6. 明确回鹘人西迁新疆的重大历史意义，并可作为新疆和中亚历史划分的界线。
7. 随同回鹘人的西迁，当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合成文化。
8. 首次介绍了伊斯兰时代回鹘文学的重要作品《福乐智慧》。
9. 指出萨曼尼王朝（Samanids）和帖木儿王朝在中亚史中的意义，并唤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注意。

以上论点一直到今天尚对日本的中亚史研究给予影响。

四、补正

二书虽有上述种种优点,但毕竟时间已过去 40 多年。从今天的学术水平看,当然有应补正之处。为了读者的方便,这里仅举出其主要者:

1. 作者认为中亚由于其固有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历史上未曾产生过大势力的政权。帖木儿帝国可看作一个例外。但笔者认为,在中亚游牧民与绿洲定居民保有相互紧密关系时,中亚地区也曾建立过强大的国家。其中的例子有贵霜王朝、萨曼尼王朝、帖木儿王朝等。这里不能详细阐述。

2. 作者把中亚游牧民看作“低级文化”的持有者,他们常向绿洲的定居民进行“苛刻的诛求”,为此北方的游牧民与南部的定居民常处于对立的状态。虽然游牧民的文化与绿洲定居民的文化有性质上的不同,但不能称之为低级文化。再说,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除对立外,还有互相利用所长的“共生”一面。

3. 作者注意到了伊斯兰教的传入对中亚民族文化的形成发生了巨大影响。但伊斯兰教的影响不只限于文化方面。此外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也对中亚居民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变化。

4. 作者认为伊斯兰教对异教的古代文明曾产生过破坏作用。近年来则提出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曾持宽容态度的说法。

5. 作者认为,在中国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是和“回鹘”、“回回”名字有关。这一解释虽是正确的,但所谓回鹘、回回是指喀拉汗朝(Karakhanids)而言,而回教则指喀拉汗朝统治下的突厥人的宗教而言。

下面我还想提到书中的一些细节:

1. 作者曾期待会有祆教(拜火教)经典的新发现。遗憾的是,

迄今并无这方面残卷的发现。这成为中亚史上的一个谜。

2. 关于作者称之为木简的东西,之后所谓“居延汉简”多有发现。这方面可参看大庭修的《木简入门》(讲谈社学术文库,1984年)、永田英正的《居延汉简研究》(京都,1989年)。

3. 作者说,证明大夏(Bactria)文化曾希腊化的证据不多。但之后在今阿富汗境内发掘出希腊城市的遗址(Ay Hanum)。作者的这一结论尚有再检讨的必要。

4. 作者在论述西域文化、文明时常常谈到西域的壁画(《文明史》第五章,《文化史》后篇第五章)。之后,在中亚撒马尔罕(Samarkand)、片吉坎特(Penjikend)等地发现了许多新的壁画。这些新发现的壁画进一步证明羽田氏关于西域文化源自西方的结论。这方面最新的参考书有Albaum(加藤九祚译)的《古代撒马尔罕的壁画》(1980年,东京)。

5. 作者认为受中国内地文化、文明影响特别明显的地区,为高昌吐鲁番及其附近。这里出土了大量的汉文文献,表明当地曾为汉族人民的居留地。近年来这些汉文文书以《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形式已陆续刊行,加速了对新疆汉族文化、文明的研究。

6. 作者介绍了回鹘摩尼教徒使用的、非常有趣的合成日历。之后,这种同样的合成历又有发现(参见吉田丰氏的《粟特语杂录二》,载*Orient*,1988年)。另外,继承作者关于回鹘人摩尼教文化的最新研究,有森安孝夫的《回鹘摩尼教史研究》(大坂大学文学部纪要,1991年)。

7. 作者曾谈到714年阿拉伯将军屈底波(Kutaiba)进军喀什一事。现在此说应予以否定。屈底波实际只进军到费尔干盆地。

8. 作者说回鹘人西迁塔里木盆地时,当地人曾被屠杀、驱逐,

之后回鹘人与当地人杂婚,结果当地居民失去其特点……。说回鹘集体屠杀、驱逐当地人之事,尚无具体史料证明。现在新疆居民的亚利安人的某些体质特点早为人们所注意。作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有失慎重。回鹘人迁居新疆塔里木盆地后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应为今后研究的课题。

9. 作者认为回鹘西迁的结果,是建立了对整个新疆地区的统治,并认为喀拉汗朝也为回鹘人建立。但目前学界认为喀拉汗朝当为葛逻禄(Qarluq)部人建立。也有学者认为是其他突厥部族建立的。这一问题应进一步研究。

10. 作者说 960 年萨图克·布格拉汗(Satuq Bughra Han)率 20 万帐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实际上,萨图克在 955 年已死去。皈依伊斯兰教的应为其子木萨(Musa)。

11. 羽田氏为了证明莎车(Yarkand)其时已接受伊斯兰教,介绍了写有 1096 年日期的一件买卖土地文书,文书的末尾有相关人用阿拉伯文、回鹘文的签名。但实际上应为 1112、1114 年,不是 1096 年。

12. 作者在谈到 11 世纪成书的《福乐智慧》一书时说,“也有用回鹘文书写的写本存世,这是为了不习惯阿拉伯文字的人书写的……”。这一点我以前认为是正确的,并全部接受(见间野英二《中央亚细亚史》,讲谈社现代新书,页 192)。现在我们知道此书的回鹘文写本,不是在人们尚不习惯于阿拉伯字母的 11 世纪的喀什附近写成,而是在阿拉伯文字已很普及的 15 世纪的帖木儿王朝首府赫拉特(Herat)重新抄成,是源于帖木儿王朝时期突厥文化复兴运动的产物。

13. 作者认为“大食”一词来自祆教徒使用的王冠(tadj)。现